安井息轩《左传辑释》的成书及其阐释特征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by Sokken Yasui and Its Hermeneutic Characteristics

陈彦辉（**Chen Yanhui**）

内容摘要：《左传辑释》是日本明治时期安井息轩汇集众家之说对《春秋》经文和传文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安井息轩通过近二十年的收集文献、深入研读，最终完成此书，希望通过经义的探究能够经世致用、治世济众。安井息轩《左传辑释》详于传而略于经，重视考证，对于公羊、谷梁派的观点不予采纳，对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择其善者而从之。《左传辑释》博采众长、断以独见，呈现出广征博引、断以独见、考论结合的阐释特征，在春秋左传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日本汉学；安井息轩；《左传辑释》；左传学；

作者简介：陈彦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本文为 2022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春秋行人与战国策士辞令比较研究”【项目批号：GD22CZW0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by Yasui Ichihin and Its Hermeneutic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is an important work written by Yasui Ichihin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which has well annotated the 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rough gathering all the opinions about it. Yasui Ichihin had completed it after extensively collecting and intensively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for nearly two decades, hoping that through exploring Confucian classics, it could be applied to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This book is elaborate in the commentaries but brief in the classics,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extual research and refusing to adopt the views of the schools of Gongyang and Guliang. The author had critically dealt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chola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book draws on the strengths of others and always gives lots of unique insights, and it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its extensive citations, independent insigh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In a

word, 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studies of *The Zuo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words: Japanese sinology; Sokken Yasui;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Studies on *Zuo Zhuan*

Author: Chen Yanhui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main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mail: cyh234@163.com).

春秋左传文献传入日本时间较早，据《日本书纪》（『日本書紀』，720），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公元 513 年赴日时就携带《春秋》，这是有关《春秋》文献流传到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录。[1] 根据日本圣德太子（Shotoku Taishi）《宪法十七条》（『十七条憲法』）对《左传》引用，可以说明在公元 604 年之前，《左传》已经传入日本。[2]《春秋》和《左传》作为儒家经典，在日本研究者众多，成果比较丰富，其中江户和明治两个时期成就最高，出现了林罗山（Lazan Hayashi）的《春秋劈头论》（『春秋劈頭論』）、中井履轩（Riken Nakai）的《左传逢原》（『左傳逢原』）、荻生徂徕（Sorai Ogyu）的《左传古义》（『左傳古義』）、安井息轩（Sokken Yasui）的《左传辑释》（『左傳輯釋』）和竹添光鸿（Takezoe Koko）的《左氏会笺》（『左氏会箋』）等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之中，江户时期开始撰写，明治初年完成并出版的安井息轩的《左传辑释》是一部春秋左传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日本幕末时期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安井息轩，名衡，字仲平，号息轩。自幼跟随父亲徂徕派学者安井沧州（SoshuYasui）学习，后师从篠崎小竹（Kotake Shinozaki）、古贺侗庵（Dongan Koga）、松崎慊堂（Kodo Matsuzaki）。曾在饫肥藩藩校任教，担任藩主侍读，后任昌平坂学堂教官。著有《周礼补疏》（『周礼補疏』）《书说摘要》（『書説摘要』）《管子纂诂》（『管子纂詁』）《论语集说》（『論語集説』）等，其中《管子纂诂》《论语集说》等 6 部独撰或订正的著作被收入服部宇之吉（Unokichi Hattori）编辑的《汉文大系》（『漢文大系』）。安井息轩是幕末大儒，代表了幕末儒学的最高水平。日本学者川田刚（Tsuyoshi Kawada）称“议论文章，最醇且正，〔……〕尤用力于汉唐之注疏，参以众说，能发先儒所未发，为文取法唐宋，上溯秦汉，古色苍然”（转引自 金培懿 46）。黄遵宪称“余读其著作，体大思精，殊有我朝诸老之风，信为日本第一儒者，物茂卿、赖子

1 参见 张德恒：“6 至 16 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考”，《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7）：47-54。

2 参见 张德恒：“6 至 16 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考”，《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7）：47-54。

成辈，恐不足比数也”（转引自 张小敏 王长华 225）。清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在《管子纂诂序》中称：“世有读仲平之注，平心和气，缕举众说，互相印证，而以讲求文字者，讲求典章制度，礼乐韬钤，政刑法律，而删其繁芜，撷其菁华，经之以经，纬之以孔孟之训，其有裨于世，讵浅鲜乎”（安井衡，《管子纂诂》33）。安井息轩作为日本“江户儒学集大成者”（王晓平 130），在春秋左传学研究方面“有相当功力”（沈玉成 刘宁 416），在日本汉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本文拟从安井息轩撰写该书的背景入手，分析其阐释方法与阐释特点，以确定该书的在春秋左传学史上的学术价值。

一、《左传辑释》之成书动因

《左传辑释》成书动因，安井息轩在《左传辑释序》中有明确说明：

> 年四十始来江户，稍稍得闻古人之绪言，窃谓士之生于斯世，岂偶然者哉？当须有所树立以为乱世之用。方今封建为治，虽礼俗异宜、治乱殊途，其大势则粗与周季同。士之所当取法，莫《左传》为善焉。因潜心于此书，用力之久，恍然若有所得。而才力浅薄，与心违。今老矣，不能复有所为，乃出十数年来所蒐辑，欲笺释以为一书〔……〕如此者复四年，哀然成帙，今兹七月始脱稿，其详于传而略于经者，不独经义深奥难窥，传义明然后经可得而言也，因名曰《左传辑释》云，明治三年庚午冬十月。（卷一 29）[1]

安井息轩在自序中详细叙述了自己来到江户之后的心路历程、读书体悟、人生追求以及对时局的感受。从该书内心独白式的自序中我们可以清楚获知安井息轩撰写此书的目的和直接动因是经世致用、治世济众，下面从三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第一、安井息轩“有所树立”的人生追求。他在自序清楚表明“士之生于斯世，岂偶然者哉？当须有所树立以为乱世之用”。“有所树立”即是有所建树，意味着应该取得成就或建立功勋，其最高的追求就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所说的“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杨伯峻 1199）。作为自幼精研儒家经典，浸润于儒家思想之中的安井息轩来说，“三不朽”已经成为其人生终极目标和终极追求。作为一个儒者，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是最佳方式，因此，在安井息轩的一生中才有上文提到的《周礼补疏》《毛诗辑疏》《书说摘要》《管子纂诂》等经、史、子、集类宏富作品问世。具体到对《左传》的研究阐释，“有所树立”是指通过对《左传》的本义的探求，去

1 本文有关《左传辑释》的引文均来自 安井衡：《左传辑释》（成都：巴蜀书社，2020 年）。以下引文仅标注卷号和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伪存真，能够获得“高矣大矣”的“春秋之义”（卷一 21），对传义的探求是获得经义的途径和手段，“春秋之义”才是目标，通过探寻蕴含于经传中的“微言大义”，服务于“以为乱世之用”的终极目的，安井息轩正是通过一部部经典的阐释，来实现其人生目标。

第二、安井息轩对《左传》的精研与经世价值的推崇。安井息轩在众多儒家经典中，对《左传》用力甚勤，前后断断续续用了接近 20 年左右时间。结合黑江一郎（Ichiro Kuroe）“安井息轩年谱”和安井息轩《自述年谱》（『自述年譜』）等文献，我们可以得知他深入研读《左传》是在天保四年（1833 年）三月，这一年他首次来到江户，任藩主侍读，并于同年六月主持《左传》讲读，也就是上文中所说“年四十始来江户，稍稍得闻古人之绪言”，这一年他 35 岁，自序中所说四十岁应是大致说法。主持讲读需要他必须对《左传》十分熟悉，因此可以推测他在这个时期开始搜集春秋左传相关资料，虽然当时他不一定有撰写《左传辑释》的想法，但也为该书写作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从该书的最终完成时间我们可以推算出，他应该是在 50 岁左右（1848 年）开始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并研读各家注释。这个过程大约花费近 20 年的时间，并在明治元年（1868 年）完成初稿。同年九月，彦根藩学校送来该书的制版格式，他又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审校誊写，最终在明治三年七月，即公元 1870 年 7 月脱稿，并确定《左传辑释》之名。彦根藩学校于“明治辛未孟春”（39），即明治四年（1871 年）3 月将此书刊刻完成。该书刊刻后，安井息轩通过日本使臣柳原前光（Sakimitsu Yanagiwara）邀请应宝时为该书做序，在此之前，应宝时于 1867 年曾为他的《管子纂诂》撰写过序言。明治四年四月，日本使臣柳原前光到天津，带来新刊《左传辑释》，应宝时于当年七月完成序言。从对《左传》的接触、阅读、讲读，到搜集文献、撰写书稿、反复订正、撰写序言直至刊行，安井息轩在该书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安井息轩对《左传》价值极为看重。他之所以这么重视《左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士之所当取法，莫《左传》为善焉”。在安井息轩看来，《左传》有丰富的修身智慧和治国理政思想，有志于建功立业、报效国家者，《左传》是最好的教材。

第三、回应幕末“乱世”的社会需求。“乱世”是安井息轩对当时日本时局的界定。“以为乱世之用”的终极目的，即为日本幕末时期动荡的时局提供治世之法。关于日本的时局，安井息轩的看法是：“方今封建为治，虽礼俗异宜，治乱殊途，其大势则粗与周季同”（卷一 29），他认为当时日本的时局和西周末年相同，都面临巨大的国外压力和国内的政局变化，其中西方世界的冲击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影响更为强烈。以 1853 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军舰进入江户的“黑船事件”为标志，在欧美强硬的武力威胁下，日本幕府被迫开放国门，与美国、英国、俄罗斯、荷兰等相继签订通商条约，但条约签订导致朝廷和幕府之间发生激烈冲突。随着讨幕运动开始，幕

府权威一落千丈，经过1868年戊辰战争，德川幕府宣告灭亡，幕末时代结束，进入了明治时代。幕末时期的开始和结束，与安井息轩开始集中搜集资料到该书脱稿的时间（1848-1870）几乎完全重叠。国内政局的激变对安井息轩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想从左传中取法，有益于当世。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1864年刊行的《管子纂诂》的序言中曾经有相同的表述："方今洋夷猖獗，海内多事，择其法而施之，必有能因祸而为福者矣"（安井息轩，《管子纂诂》26）。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安井息轩致力于《左传》阐释，本着实事求是治学态度，通过对传意的探寻来获得春秋大义。

二、《左传辑释》的阐释方法

安井息轩在《左传辑释》的《凡例》中说明了自己的阐释方法：

> 此编专解传。但传例，一释可推，及属辞比事，而经义自明者，置而不释焉。其特因告庙赴告而书之，无义足传者亦然。则有时乎及经，亦唯传意之求，不敢臆断。后儒解经，率主公、谷，甚者较彼此之得失，议他日之是非，锱计铢量，以弊其狱，其言若可听，而实与经背驰，今概不取。刘炫而下，驳杜而是者，收而不论。其涉疑互，及其义非，而其言足以惑人，则载而辨之，余皆芟落。清人精于考证，每逢疑义，博引广征，动数百千言，实事求是，固不得不然，但此篇主搜辑，致卷帙浩大，读者反惑。今摘其要，义通则止，避烦也。皇国儒先，亦有补释左传者，予长于鄙，家又贫，勿论其未雕，虽既梓行者，力不能致，及来此都，去泛就要，汲汲乎唯古之稽，以故皆未及见，独得中井氏雕题而已。待其裒聚，岁不我与，他日得见，当补辑之，非敢简先辈也。（卷一 32）

《凡例》是掌握该书阐释方法的总纲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该书专门解传。全书对经文注释极为简略，而对传文注释十分详尽。如文公元年，对经文的注释仅有三处：（1）"文公"下注释"名兴，僖公子。谥法，慈惠爱民曰文，忠信接礼曰文"；（2）对杜注"七月而葬，缓"的注释，"衡案，丧纪不数闰月。杜云：'七月而葬'，非，余详于三十三传"；（3）对杜注"礼，卿不会公侯，而鲁大夫皆不贬者"一句的辨正，"衡案，春秋鲁史〔……〕与此自别"（卷八 167-171）。此句解释共64字。对比传文，仅对杜预关于闰月的注释，息轩的注释有380字之多，可见其用功之多。此外，对于"传例"、"属辞比事"等语意浅显、经意自明的内容或者"告庙赴告"等无关传义的内容不再注释。二是不采纳公羊、谷梁学派学者的观点。他认为主张公羊、谷梁学者的观点"较彼此之得失、议他日之是非、锱计铢量、以弊其狱"，他们的阐释好像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却"实与经背驰"，没有领悟经文本义，所以不予采纳。三是驳杜者区别对待。安井息轩采取折衷为

学的态度，对于历代学者批评杜预的观点，他视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方法处理。对于“驳杜而是者”，直接采纳引用，不加评论。对于“涉疑互及其义非，而其言足以惑人”的观点，予以引用并加以辨析，除此之外都不引用采纳。四是对待清人考证成果摘其要义。安井息轩认为清人精于考证，特别是对于有疑义之处，能够博引广证，但是“动数百千言”，考证过于繁琐，如果全文引用会导致卷帙浩大，容易引起读者疑惑，也不利于读者阅读，所以他直接“摘其要义”，尽量简要，避免文字烦杂；五是对待本国学者研究成果，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他只采用了中井履軒的《春秋左传雕题》的观点。《左传辑释》五个阐释方法总体上易于理解，但其中关于对待杜预注释的处理稍显复杂，既是该书注释的主体，也是体现该书阐释方法的重点，下面略加讨论。

安井息轩最看重杜注。《左传辑释》以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为底本，杜注在该书中处于首要位置，全部采用，排版时用略小于经传的文字放在经文或传文之下，如：

> 《春秋》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杜预《注》：“周平王也。实以壬戌崩，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春秋》不书实崩日而书远日者，即传其伪以惩臣子之过也。襄二十九年传曰：‘郑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会葬。今不书葬，鲁不会”。（卷一 32）

杜注主要解释了经文中涉及到的三个问题：一是“天王”是指周平王；二是经文书写的周平王去世的日期错误，并指出错误的原因是“欲诸侯之速至”；三是说明周平王去世经文却不书会葬的原因，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杜注对经文的阐释非常清晰，不仅指出经文错误，也揭示出经文如此书写的背景因素。此类注释在全书中所比例较高，安井息轩对此都采取只收录而不加任何阐释的方法。

历代学者对杜注的讨论很多，对于如何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安井息轩在《凡例》中说：“刘炫而下，驳杜而是者，收而不论。其涉疑互，及其义非，而其言足以惑人，则载而辨之，余皆芟落”（卷一 32）。从隋代刘炫开始至清末学者成果中，安井息轩选取两类：

第一类：对杜注补充阐发。当安井息轩赞同杜注，但是认为杜注解释过于简单，不够清晰，容易引起疑问时，就进一步说明，如：

> 《左传》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
>
> 杜预《注》：结成易二田之事也。传以经不书祊，故独见祊。
>
> 衡案：成，平也。言结易田之约，因以与郑平也。传独言祊者，桓公欲得祊田，遂以废周公之祀，罪有所归焉。（卷二 171）

传文是对经文“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的注解，我们把经传的内容结合到一起，并不能清晰把握鲁桓公和郑庄公会盟的内容。于是杜注补充说明会盟是完成“易二田”，即交换祭田之事，说明了只写“祊”不写“许”的原因，是在前面的经文“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卷二170）中只写了“许田”，所以这里单独写“祊”。杜注这里只是叙述了此次会盟的原因，对于经传如此书写的原因却未揭说明，因此安井息轩首先解释“成”的含义，指出“成”表面上看是完成祊、许二田交易，实质上是鲁国与郑国达成协议。对于杜注“独见祊”的解释，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指出鲁桓公“废周公之祀”之罪，许田本是鲁国祭祀周公之邑，祊田是郑国祭祀泰山之邑，桓公却因欲得祊田而废周公之祀，行为失当。安井息轩补充了理解经传本意的关键信息，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类：纠正杜注。杜注有许多错误之处，对此历代学者都会指出，安井息轩指出杜预注释的错误，并加以匡正。如果杜注错误比较明显，属于字句理解等方面的问题，安井息轩直接指出错误并加以说明，一般不再引用其他学者观点，如：

>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
>
> 杜预《注》：不因阻隘以求胜。
>
> 衡案：阻，隔也。言不以兵隔绝之险隘之地也。下文“隘而不列”自彼言之，“阻而鼓之”，自我言之，“阻隘”分言可以见矣。注非。（卷六 33）

这是《左传》关于宋楚泓水之战的记载。杜注认为传文中的“阻隘”是一个词，没有过多解释。安井息轩认为杜预理解有误，“阻”“隘”应是两个词，含义不同，“阻”是用兵隔绝之义，“隘”是地势险隘之义；这两个词的视角也不一样，“阻”是从说话者的角度来说是派兵攻击，“隘”是从对方的角度而言遇到险隘的地势而不能排兵布阵。所以在安井息轩注释的最后用“注非”明确表面自己的看法。

当杜注出现的错误有学者已经指出时，安井息轩直接引用这些学者的成果，自己不再发表意见，如：

> 《春秋》隐公五年：五年，春，公矢鱼于棠。
>
> 杜预《注》：书陈鱼，以示非礼也。书棠，讥远地也。今高平方与

县北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

《辑释》：阮元云："《史记》作观渔于棠。《汉书 · 五行志》亦作渔，此古字假借也。《史记正义》引杜注，唐，作棠。"（卷一 107）

鲁隐公不听大夫宫之奇劝谏，到棠观鱼。杜预把经文中的"矢鱼"解释为捕鱼者陈列所捕之鱼，安井息轩认为此解不正确。他认为阮元的注释比较恰当，阮元以《史记》《汉书》为据，认为"鱼"应为"渔"，安井息轩直接引用阮元的观点，自己不再加以讨论说明。

安井息轩《左传辑释》独具个性、最具特色的阐释策略就是其"专解传"的释经方法。尤以"专解传"的经学解读法最为独树一帜。自春秋左传学文献东渐至日本，其流传之初仅限于上流社会及寺院僧侣之研习，未普及于民间。当时学者们所推崇的首推《春秋胡氏传》。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左传》学日益繁荣，研究者日众，影响力亦日渐扩大。然而，此时期成果的共同特点是经传并重，学者在注释时，对《春秋》和《左传》给予同等关注。增嶋兰畹（Ranen Masujima）的《读左笔记》（『読左筆記』）和东条一堂（Ichido Tojo）的《左传标识》（『左傳標識』），则标志着之学风格开始转变，开始更加专注于《左传》的阐释，都以驳正杜注为主要内容，通过对杜注的批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到了安井息轩在《左传辑释》中明确提出"专解传"治学方法，较之曾岛固和东条一堂治学路径更加清晰、观点更加鲜明，形成安井息轩独特的治学风格。其提出"专解传"的学术主张，不仅彰显了其独特的学术方法，更是其由"明传意"至"通经义"经学解读方法的学术宣言。安井息轩的《左传辑释》以其独特的阐释方法，为经典文献的解读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不仅为《左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

三、《左传辑释》的阐释特征

清代经学家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371-372）。戴东原治学广博、通贯群经，天文、小学、律算、舆地诸学皆有很深造诣，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说的"淹博""识断""精审"，实际上是提出了治经的基本要求，也可以作为判断解经之作是否合格的三个标准。三者之间联系紧密，互为表里，一体三面，"非博通难以有识断，无识断而强作解人，必流于臆断，而欲识断精审，又非专精不可"（虞万里 62）。从安井息轩《左传辑释》一书来看，"淹博"之难在于春秋经传的阐释涉及到古代经典、历史典籍、词语训释、典章制度等，要求作者必须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处理如此繁复的问题；"识断"之难是指从晋代杜预到清代乾嘉学派以及日本学者学者对《春秋》《左传》的上百家注释

中，进行比较判断，反复推敲，最终断以己意，成一家之言，其难度非常人所能想象。“精审”之难在于用什么方法来阐释《左传》更能够求得传意，进而直达经义。《左传辑释》不仅体现“淹博”、“识断”、“精审”释读经传的总体要求，同时呈现出广征博引、断以独见、考虑结合的阐释特点。

（1）广征博引。安井息轩学识广博，在《左传辑释》中通过广泛搜集历代经典文献和学者观点，对经传文本进行多维度的阐释。就安井息轩自身的学术积淀而言，涉猎较广，如川田刚在序言中所说，“先生一代耆宿，绝意仕进，专讲古学，先是所著《周官补疏》《毛诗补疏》《书说摘要》《论语集说》《管子纂诂》逐年刊行，而《仪礼》《国语》《孟子》《荀子》并有成说”（卷一 11）。安井息轩学养深厚，在经学、史学、子学等领域皆有成说，无论是学问的深度还是广度，都非一般学者可以企及。《左传辑释》吸收了自汉晋至清末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东汉服虔、晋代杜预、隋刘炫、唐孔颖达、宋林尧叟、明李惇、陆粲、傅逊、清惠栋、万斯大、沈彤、马宗琏、陈树华、毛奇龄、焦循、赵翼、王念孙、王引之、阮元、顾炎武等。在安井息轩引用的学者中，清代学者为主，以桓公二年经传为例，引唐孔颖达 7 次、明陆粲 4 次、清李惇 1 次、清焦循 1 次、清阮元 1 次、清顾炎武 1 次。[1]8 人之中，有 6 人是清代学者。这些学者在春秋经传、小学等领域皆有很深造诣，如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明代陆粲《左氏春秋镌》《左传补注》《春秋胡氏传辨疑》，清李惇著有《左传通释》、焦循《春秋左传补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万斯大《学春秋随笔》、毛奇龄《春秋毛氏传》等。

在引用大量有关春秋左传研究成果之外，《左传辑释》还涉及到大量经学、史学、小学等方面的文献的运用，即“今其著《左传辑释》也，制度征诸三礼，占筮稽诸《周易》，天象、时令、名物、训诂验诸《月令》《夏小正》《尔雅》《说文》《考工记》，参之《公》《谷》以订其异同，质之《诗》《书》《语》《孟》以析其义理，证之《外传》《史记》《世本》《战国策》以覈其实迹”（卷一 17）。这些文献运用无疑使其对春秋左传的阐释更加具有说服力，如：

> 《左传》隐公元年：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
> 杜预《注》：祭仲，郑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
>
> 衡案：雉即絼之假借，《周礼·地官》封人职：“凡祭祀，饰其牛牲”，“置其絼”，注郑司农云：“絼，著牛鼻绳，所以牵牛者。今时谓之雉，与古者名同。”玄谓：“絼当以豸为声”，解同音假借之意。以补先郑之说也。雉经之雉，亦絼之假借，当训绳或依雉字解之，非也。如雉长短，许慎、戴礼及韩说，以为四丈，古周礼说以为三丈，杜氏依用之，未详孰是。何休云：“雉二百尺”，此则大长矣。（卷一 64-65）

1 参见 安井衡：《左传辑释》卷一，成都：巴蜀书社，2020 年，第 174-192 页。

关于“雉”的含义，杜注释“雉”为长度单位，以墙为例，一雉长三丈，高一丈。至于这样解释的理由并没有详细说明。安井息轩从造字法的角度说明“雉”是假借字，是“緆”的假借。并引用《周礼》和郑司农、郑玄注释，认为是同音假借。关于一雉的长度，提出三种说法，一是按照周礼的三丈；二是依据许慎、大戴礼、韩说，为四丈；三是东汉何休提出的二百尺。安井息轩关于“雉”字的解释就涉及到《周礼》《说文》《大戴礼》三种文献以及何休、郑司农、郑玄注释，可见其掌握材料之丰富。

（2）断以独见。历代注解春秋左传的学者数量较多，观点各异。安井息轩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公正，如：

> 《左传》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
> 杜预《注》：传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不早为之所，而养成其恶，故曰“失教”。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於杀，难言其奔。
>
> 衡案：《郑风》《将仲子序》云：“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其诗三章，皆以庄公拒祭仲之谏为词，是郑人之志，以不早爲之所，爲庄公之失。仲尼是之，不言郑人，而称郑伯，故丘明以谓之郑志释之矣。仲尼之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郑伯志于杀，而难言出奔，有此理乎？况郑伯特失教而已，及其叛，不得已而攻之，始非欲杀之也。〔……〕传释其意曰“难之也”，言破之极难，以终上文如二君之意。左氏解经之精如此，人谓不受仲尼之旨，吾不信矣。（卷一 68-69）

关于传文中的“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两句话，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差异很大，争议的焦点在于“郑志”是什么和为什么“不言出奔”的问题。杜注认为“郑志”是郑伯杀段。安井息轩认为杜注关于“郑志”的解释背离了经传的本意，他引用《将仲子序》说明，郑人认为郑庄公最大的过失在于未及早处理共叔段的放纵行为，即传文所说的讽刺郑伯“失教”，而决不是“杀”。安井息轩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皆郑伯失教所致”，这才是传文本意，杜预的问题在于误读“郑志”，并且过于执着于“郑志”。对于“不言出奔”，杜预解释为“郑伯志在於杀，难言其奔”，把“志在于杀”作为“不言出奔”的理由，过于牵强，让人不明所以；安井息轩认为“不言出奔”的实质是共叔段势力强大，势力强大到与一个国家实力相当，所以郑伯与其交战才能“如二君”，很难对抗，这里的“难”是难以战胜、难以破敌。孔

子修订春秋时之所以强调二国交战的“克”，却“不言出奔”，是想让后世知道“强臣难制”，势力一旦形成，“破之极难”。以此告诫后人。他认为这是左氏解经的精妙之处，真正理解了经文的本意。安井息轩的分析解读引经据典、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观点客观，令人信服。

（3）考论结合。安井息轩注重考据与义理相结合，把实证性研究与义理分析融合到一起，如：

>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禘于庙。
>
> 杜预《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尝。新主既特祀于寝，则宗庙四时常祀自如旧也。三年礼毕，又大禘，乃皆同于吉。（卷七 164）

孔颖达《正义》引《释例》对此进一步解释：“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丧礼祭祀于寝，不同之于宗庙。宗庙则复用四时烝、尝之礼也。三年丧毕，致新死者之主以进于庙，庙之远主当迁入祧，于是乃大祭于大庙，以审定昭穆，谓之禘”（578）。二者观点一致，认为“烝”“尝”是时祭，“禘”是三年之后举行的大祭，“特祀”是用丧礼在寝而不是庙祭祀木主。安井息轩认为杜预的观点不正确，他引用陆粲、万斯大、黄宗羲三家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杜注固失，而三家者亦未为得”。关于“烝、尝、禘于庙”，他认为：“祔后言祀，非小祥大祥禫祭而何？既禫，则纯吉矣，然后言烝、尝、禘于庙，是三年服毕，始合祭新主于庙也”。简言之，“烝、尝、禘于庙”是丧毕后合祭新主于庙。此外他认为“特祀”是“烝尝禘之爲合祭”，冬祭的“烝”和秋祭的“尝”是时祭，“禘”原是大祭，当传文把“禘”与烝尝并列在一起，表明三者都是时祭，而不是大祭。传文“必并言烝尝禘”的原因正是在于“丧毕以合祭新主于庙”，安井息轩的观点次第明晰，通过他的详细考证和对经义的条分缕析，我们发现“传文未尝与礼相违也”（卷七 164-166）。其他学者观点的解释看似合理，其错误正是在于违背了制礼的本意，即“新主与祖王同居一庙，亵黩已甚，岂先王制礼之意哉？既祔后，主反于寝，似与丧礼每加以远相悖”（卷七 166）。

安井息轩作为江户时代儒者代表，其学根于六经，积近二十年之功得以完成的《左传辑释》，广征博引、缕举众说、博采众长、互相印证，是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彦根藩知事藤原直宪（）称其“广引博证、断以独见”（卷一 10），能够抉摘圣人之意，指出其具有治世济众、经世致用的价值。应宝时在《左传辑释》“序”中说：“仲平先生既全录杜注，而择取诸说之至当者附之，又间以其国人中井履軒之说益之，至其所自为说，尤精审不苟。〔……〕凡若此等，尤足使世之轻议《左传》者，无所置疑，关其口而夺之气。然则左氏固有功于春秋，而先生亦实有功于左氏矣。〔……〕

方今遐迩，同风文教日盛，学者由传以进于经，‘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则此书固为先导也”（安井息轩，《左传辑释》 9）应宝时认为安井息轩观点博采众长，严谨精审，指出其通过解传来理解经义的治学方法有开创之功，同时把他对《左传》的贡献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相媲美，这是对息轩《左传辑释》价值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评价。安井息轩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经术合一的研究目标，折中为学、实事求是的为学风范，“专解传”的学术主张，“广征博引”“断以独见”“考论结合”的阐释特点，对明治时期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以及对春秋左传学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学术影响力扩大有重要推动作用。

Works Cited

戴震撰、张岱年编：《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 年。

[Dai Zhen and Zhang Dainian, 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Dai Zhen*.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1995.]

金培懿：“江户宽政年间以降学术态势与安井息轩之学风”，《国际儒学研究》第 5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8-62 页。

[Jin Peiyi. “The Academic Situation and Yasui Ichihin’s Academic Style Since Kansei of Edo Period.”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Studies* Vol. 5.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28-62.]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 17 卷。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

Kong Yingda. *Exact Implic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Vol. 17. Carved in the 6th Year of Qingyuan Period in the Song Dynasty by Shaoxing House, Revised and Passed on to the Yuan Dynasty.]

王力：《王力文集》第 16 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年。

[Wang Li. *Essays of Wang Li* Vol. 16.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0.]

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年。

[Wang Xiaop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Studies of Book of Songs*. Beijing: The Academy Press, 2009.]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

[Shen Yucheng and Liu Ning. *The History Draft of The Zuo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2.]

安井息轩：《左传辑释》。成都：巴蜀书社，2020 年。

[Yasui Sokken. *The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Zuo Commentary*.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0.]

——：《管子纂诂》。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影印版，2017 年。

[—.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Guanzi*. Chengdu: Sichuan UP, 20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Yang Bojun. *Chun-qiu Zuozhuan Zhu*.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90.]

虞万里："略论中国传统学术之专精与兼通"，《社会科学》2（2006）：62-75。

[Yu Wanli. "'Traditional China Studies' Discussion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 (2006): 62-75.]

张德恒："6 至 16 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考"，《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7）：47-54。

[Zhang Deheng.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Literatur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Japan from the Sixth to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017): 47-54.]

张小敏、王长华："日本汉籍安井息轩《毛诗辑疏》的宗经意识及其实践方式"，《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春之卷（2020）：225-231。

[Zhang Xiaomin and Wang Changhua. "The Worship and Practi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Compi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Mao Poetry by Japanese Chinese Yasui Ichih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y* Spring (2020): 225-231.]